

整風一個月的体会

梁思成

整風开始以来已經一个月，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在仅仅一个月的期間，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風，揭發了無數三大主义的具体事实。从报章、杂志上，从各机关、学校的牆壁、黑板上，从广播中，从街头巷尾的談話中，从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中，从許多高等学校的“自由論壇”上，所看到、所听到的，無非都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党中央一直到任何一个小單位的支部，無不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真是一团糟！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充满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它就是‘三害’的化身！”有許多人就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乃至已經下了这样一个結論了。有人說以前对共产党存着幻想，現在幻想破灭了。有人說从前对共产党有信心，現在信心消失了。甚至有些已經申請入黨的人也声明他要撤銷申請了。他們陷入悲觀、失望的境界中。这种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不占少数。

整風中揭發出許多具体錯誤事實，把黨理想化的人

吃惊失望”，政視党的人“称快高兴”。

的确，对于一些过去把共产党理想化的人，这样的揭發他們吃惊的；对于一些一向不滿意于共产党的人，这样

的揭發正好使他們拍手稱快。的确，在“三反”、“五反”中，在鎮反、肅反中，是有些人被斗錯了的；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是犯了教條主義的偏差的；在五年計劃的擬定中，是有偏急、偏高的主觀主義的。這一切，誰都承認是黨所犯的一些錯誤。至于個別黨員在日常執行任務中，以至在私人生活作風中所犯的錯誤更是不勝枚舉的。許多具體的錯誤事實，這次都揭發出來了，所以令拥护黨的人吃驚、失望，令敵視黨的人稱快、高興。

**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風也使我徬徨、苦悶、沉默，
我对党也有很多不滿。**

从我个人在工作中同党的接触來說，我对党不滿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風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徬徨、苦悶、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徹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強調節約，大量建造了既不適用，虽然廉價但不經濟，又不美觀的建築，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轉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轉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員一脚踢开，党自己攬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等等。在节约声中，北京市委盖了那座不可一世的，大而無當的，鋪張浪費的，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間的市委大楼，我很有意見。我尤其不满意党在許多措施中專斷獨行，对許多学术性的分歧意見用狂風暴雨来刮得人、淋得人連喘气都喘不

出来，更不用說說話了。是的，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滿的。

我从来沒有忘記是誰領導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

“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不是口头禪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評價。

八年来，我对党的領導同志，不管是哪一位領導同志，总是爭辯不休的。在我被說得真正地心悅誠服以前从来没有低过头。但是，在这样硬着头皮、繼續不断地同党抬杠的同时，我从来沒有忘記：是誰領導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从根底下鏟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對我們的压迫；是誰領導我們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胜利，从而同时保障了国民經濟的三年恢复，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偉大建設；是誰領導我們根治淮河、黃河，修筑成渝、蘭新、宝成、鷹廈、集二、黎湛等鉄路，使克拉瑪依、柴达木噴出石油，使長江大桥提前兩年合攏，使三門峽工程开工；是誰領導我們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汽車和噴氣式飞机；是誰領導五亿几千万的农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欢天喜地、敲鑼打鼓地完成了自己的“三大改造”。我从来沒有忘記是誰帮助我（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識分子）搞清楚了我到底为誰服务，給了我力量和信心。我更不能忘記每逢“五一”、“十一”的天安門前，是誰使千千万万張充滿了自信和自豪的臉孔笑逐顏开；是誰使全国几千万条紅領巾上面露出那样愉快、幸福、可爱的小臉蛋！套一句公式話——但在这里不是公式而是事实，不是口头禪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評價——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

許多缺点都揭露出来了。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可以对症下藥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聞過則喜”，“過則勿憚改”的党；是一个“虛怀若谷”的党。它的缺点“如日月之蝕焉”。党知道自己有缺点，并且分析出了“三害”。它不护短，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反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并且声明是一个長期的方針。現在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已經实行“監督”起来，鳴放了一个月，許多許多缺点都揭發出来了。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讓我們回顧一下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可曾見过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它在朝在野，和在任何一个党領導下的政府，能有这样勇气，这样度量，这样虚心，并寄予全国人民这样無邊徹底的信任，發动全国人民来給自己提意見，找缺点，进行批評？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創举，是中国共产党最勇敢、最英明的决定和措施。缺点是揭發出来了，可以对症下藥了，这些缺点就將得到改正。事实上，許多地方已經邊整邊改了。这是六亿人民的幸福。这是六亿人民所應額手称庆的大喜事。

**我絲毫沒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我相信經過整風
党將更年輕、健壯、坚强。**

凡是有政府、有組織、有機構的地方，就可能有官僚主义；凡是有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是夫妇之間）就有彼此，就可能有宗派主义；只要是一个人，就必然有他的主观成分。“三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的。世界上七八十个国家，假使它們有勇气也來揭發一下，我相信它們的“三害”不

知要比我們的多几千百倍，雖然沒有法子統計，也沒有尺度可衡量，我相信（如果能够攤出來比較一下的話），我們的“三害”不是最少的也是最少者之一。整風開始了，黨的許多缺点揭發出來了，我不但絲毫沒有對黨失望，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增強了我對黨的信心。我相信在整風結束的時候，這些缺点將絕大部分被“整”掉。洗這樣一次澡，全身的塵垢洗掉了，黨將煥然一新。它將更加年輕，健壯，堅強——更加可愛。它將以更堅定的步伐，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

我不同意從高等學校中撤銷黨委，我們需要黨的領導。

我們絕不應否定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無可置疑的。我不同意從高等學校（或其他機關企業）中撤銷黨委，我們需要黨的領導。問題在於黨怎樣領導。過去有些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的辦法是不妥當的。我們應該研究怎樣進一步發揚民主，使黨的領導作用能更好地、更正確地發揮起來。

這是一陣送暖的春風，是一場最及時的“及時雨”。

讓我們繼續大放大鳴，給黨吹毛求疵，給黨挑錯兒、找岔兒，並且幫助黨把它們“整”掉。經過團結——批評——團結，我們的黨將更加健壯、巩固、堅強，我們的政治覺悟也將隨着得到提高。六億人民將更加親密地團結起來。這是一陣送暖的春風，是一場最及時的“及時雨”。它將給我們的國家，給六億人民帶來新的生命，更大的幸福。缺点的揭發顯示出來的是光芒萬丈的前途！

正当党的缺点被無情地揭發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說：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偉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無情地繼續揭發你的缺点，也將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給你！

（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二版，文內小标题是編者加的）

讓“鳴”“放”向健康方面發展

朱学范

从中共中央 4 月下旬發出了整風指示，并热切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風之后，这一个多月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热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們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热忱，对党提出了批評的意見。應該說这是十分可喜的好現象。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繼續發揚光大，是中国共产党創造性地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良好榜样。

党为什么要整風呢，很明显，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經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党，肩負着領導六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重任。需要不断地克服缺点和錯誤，把国家事务领导得更好。因此任何一个帮助整風的人，首先應該明确：整風是为了加强党在社会主义事業中的領導作用，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离开了这一庄严的目的，那就是違反全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不能容許的。

知無不言、言無不尽不等于不講道理不明是非。

但是最近在大鳴大放的同时，居然有少數人發表取消或是削弱黨的領導的言論，想把千辛萬苦爭取得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打翻，要使歷史倒退，還有些言論是舉着馬列主義的幌子，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實質上是在那里兜售資本主义。這些言論，無疑是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珍貴的民主生活的踐踏。是一切具有愛國熱忱的人，所不能袖手旁觀的。還有些人不是從善意出發，竟以潑婦罵街的口吻，對共產黨污蔑、謾罵，甚至以卑鄙的匿名恐吓信去辱罵人家。這種惡劣行為，誰也不能容忍。“知無不言、言無不尽”不等于可以不講道理、不明是非、不分敵我。比如像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之類的言論，几乎使人不能相信這是出于一個生活在新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之口。說“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這是什麼話？人民隊伍里還能包括反革命？說“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是什麼立場？共產黨奮斗幾十年為了誰，許多革命烈士前仆後繼為了誰，老百姓是知道的。奉告葛佩琦以及和葛佩琦發表類似謬論的人，不消你們這樣杞人憂天。老百姓是最懂得是非的。他們懂得是誰把工人從奴隸生活中解放出來，是誰把農民頭上的封建大山摧毀了，讓農民走上集體生產；是誰使一切愛國人民有可能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建設祖國，使人們的生活日漸向上，看見自己的幸福前途。強大的中國共產黨，覺悟了的中國人民，是不会讓歷史往後倒退的。中國必定富強，社會主義必定勝利。

党对缺点和錯誤的态度，不是隐瞒而是揭發，不是包庇而是糾正。

是的，共产党几年来在領導国家事务中間，某些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正如最近各方面提意見中所說的那样。同样共产党自己并不諱言，党员中間有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缺点和錯誤。但是党对这些缺点和錯誤，是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不是隐瞒，而是揭發，不是包庇，而是严肃的糾正。党是坚决反对这些坏东西的，这种敢于正視缺点、勇于糾正錯誤的气魄，只能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才能如此。只有壯大了的、巩固了的共产党才有这种可能。試看解放前中国历代执政者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內，几时进行过整風，几时批評过自己？几时允許人民批評过政府？百年来的历史証明，过去那些代表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阶级的政权，只能是腐朽的、欺压人民、喪权辱国的。且看前清王朝、袁世凱、北洋軍閥，以至蒋介石集团在統治旧中国时候的所作所为吧！近的再看看今天的台灣吧！美帝国主义可以到处駐兵，随便攫取經濟富源，美国人杀死了中国同胞，反而向美国道歉賠罪，只要是帝国主义想做的坏事，都可以为所欲为，能說他們是爱国的嗎？

一切批評建議都应从維护社会主义、巩固共产党的 领导出发。

現在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进行整風，正在大放大鳴，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好現象，所有拥护共产党的，維护社会主义的人，都應該不断地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精神，繼續大放大鳴。使得領導国家事务的共产党，

有可能从發現的問題中找出缺点和錯誤，加以克服改进。但是在鳴放中間我們不能模糊了总的方向，放弃了阶级意識的思想斗争，一切批评、建議，都應該从維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出發。不能讓资本主义思想抬头，不能讓歪曲言論混淆视听。欢迎展开爭論，从爭論中辨清是非。从而使所有参加整風的人和帮助整風的人，在这一偉大运动中，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并加强了团结。唯有明辨了是非，才能使社会主义事業不断發展，也唯有批判那些別有用心的歪曲言論、行为，才能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向健康方向發展。

（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二版）

吳晗談話批駁章伯鈞羅隆基

章伯鈞主張另搞一个政治設計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儲安平“党天下”的論調是惡毒的誣蔑。叶篤义的意見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論。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員吳晗在 9 日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談会上，談到他不同意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叶篤义等人的意見。昨天，吳晗接見記者，談到他对章伯鈞、罗隆基等人的意見的看法。

吳晗說，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政治方面就沒有。他要求由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組成

政治上的設計院。這話是很难理解的。宪法序言中講到我国的統一戰綫由共产党領導。政协章程也說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認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离开这种領導，另搞一个政治設計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滿意共产党的领导呢？吳晗說：現在国家的重大措施，都是經過各民主党派討論的。人大、政协每年开会，人大常委会每月开会，章伯鈞參加了这些會議，他應該了解討論的情況。現在他要搞一个什么政治設計院，这是不是表示他認為这些組織沒有發生作用？是不是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使人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不同意他的意見。章伯鈞還說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大家表示意見。他認為这样的会是形式主义的。国务院开会的實際情況如何，盧郁文已經在發言里介紹過了，我不再多說。但开会确实有兩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事先准备，征求意见，然后拿出一套比較成熟方案由大家討論。另一种是英美議会式的。往往抓住一个問題長期辯論，了無結果。当然，英美議会的討論也不是都沒有准备，至于內閣的討論更不能說是沒有准备。总之，章伯鈞这样提出問題，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式不感兴趣、有所怀疑呢？所以我是不能同意他这个意見的。

吳晗說，罗隆基在發言中主張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員會成立一个委員會，这个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中的偏差，还要公开声明，鼓励大家申訴委屈。这个“平反”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領導機構分开，因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的。“平

反”时除领导党外，还应由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人士参加。吳哈說：这个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一个是他对党領導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質是不符合的。罗隆基还談过民主党派發展組織的問題。他說共产党过去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工农，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旧知識分子（事实上是知識分子）当中发展，現在共产党也要发展知識分子党员，民主党派就沒事干了。吳哈說，照罗隆基的說法，知識分子都要参加民主党派，不要参加共产党，这是不符合中国目前进步知識分子的現狀和要求的。民主党派多年的工作，原来規定的目的本来在于协助共产党團結和教育知識分子。現在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提高了，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这应当使我們感到高兴。所以我的看法和罗隆基是不一致的。罗隆基还說現在参加各民主党派的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民主党派今后可能后繼無人，这和民主党派長期存在的要求發生了矛盾。这种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知識分子的年龄一般地要大一些，因为知識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年紀太小的人不可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民主党派不发展青年，只发展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長期存在了呢？我認為民主党派能否長期存在，关键在于政治立場，并不在于发展对象的年龄。青年要发展到中年，还要发展到老年，从这一点来看，民主党派的發展前途不可能、也不應該和共产党的發展發生矛盾。

吳哈說：儲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發言，这个發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

天下”的名詞。在国民党統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这是一种惡毒的誣蔑。現在全国人大、政协、各級人大、政协，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員，包括民盟成員参加嗎？在中央各部任部長、省、市任副省長、副市长的，不是有很多盟員么？这怎能說是“党天下”呢？儲安平說“‘党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源”，是極其反动的話。他把一切現象归罪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消灭的，他这话的含义豈不是要消灭宗派主义，就得消灭共产党，从而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么？誰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我們都选举过，儲安平也选举过。你現在这样說，不怕人民質問：“你是怎样当代表的呀？”有人欽佩儲安平的“勇气”。我不禁要問：勇气是要来对付敌人，还是对付人民的呢？是要維护社会主义，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呢？这个問題首先应当区别清楚。

吳晗說，叶篤义在發言中說，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應該改变，民盟組織在大学中的活动是給学校添矛盾。他又說各民主党派的基層組織，今后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強調党派关系，不宜強調發揮基層組織作用。他認為在机关、学校、企業中，全体工作人員都是同事关系。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間的牆不拆自拆。我認為，这种看法也是錯誤的和片面的。主張中共党委退出高等學校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这同各民主党派的章程、政协的章程和宪法都是抵触的。至于說民盟組織在大学里不起作用，給学校添矛盾，这要看民盟組織究竟是在进行什么活动。如果醉心于同共产党爭領導

权，那么，当然会增加一些不应有的矛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主党派是可以起良好作用的。要解决党群关系中的矛盾，关键在于党如何工作，而不在于党组织的存在。他认为各党派在机关、学校里可以发展成员，但是不要建立基层组织。这种话很难使人理解，一个党派没有它的基层组织，怎样来领导、教育它的成员呢？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党派。主张机关、学校里不要建立党派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原载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二版）

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問題

北京大学副校长 周培源

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反批评

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党号召党内外的同志们要大“鸣”大“放”。这说明了党能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地接受批评，准备把党的工作作进一步提高。向党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热情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甚至有的荒谬到这样程度，像葛佩琦那样，诬蔑党员，要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不能不引起知识界的坚决反对与无比愤怒。我们必须体会党的“鸣”、“放”方针的精神，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来判断向党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我们也必

須堅決地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向一切違反社会主义的言論與思想作鬥爭。我們一方面要向党提意見，另一方面也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儲安平对于所謂“党天下”的誣蔑性的批評，混淆了知識界的視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設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須对它作严肃的批判。

在过去几年中，祖国的高等教育事業在党的领导下，發展得很快。一个多月来，文教界的同志們也提了不少意見，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現在就我在工作中的体会，來談談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個問題，把意見提出来向文教界的同志們請教。

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線是正確的

第一，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線問題。从1952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在原有高等學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綜合大學，多科性的工業大學，單科性的工、农、医学院和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1949年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十一万七千人，到1956年增加到三十八万人。高等学校在过去七年中已有三十万零二千五百多畢業生。許多專業自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畢業生的質量也有不断提高。这显然是一個極大的成績。但是，有人認為，院系調整是不必要的，理工無須分家；如果要多培养些人，每个学校多招收些学生，扩充一些校舍与設備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們不能因为在院系調整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并因为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缺点，就否定院系調整政策的必要性。大家还记得：在旧中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模糊，系科設置龐杂；在行政上系科各自为政，在教学

上教師各行其是。在同一地區各種不同的系統常建立性質基本上相同的學校。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在大城市則更為顯著。院系調整的任務是在於使新中國的高等學校能夠大量地、迅速地培養出合乎規格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材。1952年夏，北京各高等學校的教師們積極地學習了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計劃，初步肯定了系科有關專業的培养目標，從而草擬了當時認為結合中國實際的教學計劃。在院系調整之後，教師們認真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建立新的教學制度，組織教研室並通過教研室的活動，發揮了集體力量來進行教學改革。總的說來，1952年的院系調整在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史上，是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全國的高等學校在院系調整之後，完全以新的面目出現。除了舊大學有些系科外，為了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成立了許多新的學校、新的系科、新的專業。即使與舊大學各種相同的系科中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都有極大的改變。好些系科、專業與課程，在以前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都須從頭學起。即使在原有的一些系科的課程中，為了滿足新的要求，教師們也孜孜不倦地進行學習，努力自我改造，掌握新的教學內容，上講壇傳授知識。

在高等教育部的統一領導下，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不斷地修訂教學計劃、制訂教學大綱、編譯教材，並在各種教學環節上，如講授、輔導、課堂討論、實驗、實習與考試，等等，努力鑽研，逐步改進。我認為，五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果。我們不僅輸送了大批青年干部支援國家建設，我們也培養出大量的優秀的青年教師上大課、教大班，為今后提高教學質量，進一步進行教學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也体会到，高等教育部采取这样一条路綫进行教学改革，也是完全正确的。我們學習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必須从头学起。我們只能首先學習苏联的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然后再来体会苏联先进經驗的精神實質，逐步提高我們的教学質量。所以我認為，有人批評我們的教学改革在路綫上犯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錯誤是不正确的。

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里，有科学成就的老教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們的諄諄教导，培养出大批青年教师。如果他們不这样做，而依照过去那样只指导少数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提高他們的科学水平，那末一定有許多課程开不出来，也不可能培养得这么多的青年干部。从开展科学研究向科学进军來說，也不会有像現在这样强大的基層队伍。在这里我們也必須指出苏联專家給我們的帮助，他們在培养青年、建立系科与学校、协助我們进行教学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貢献。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我們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錯誤的。我們把教学計劃、大綱、方法等等，在系科与教研室中主观地、机械地并生硬地貫徹，而另一方面不考慮条件、需要与可能，向系科与教研室要經驗、要总结。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产生了宗派主义的現象。青年教师學習苏联的教学方法比較快，老教师不像青年們学習得那样快，因此在1952—1953年間，有这样的錯誤看法：青年學習苏联比老教师积极，只有青年才能被培养成为紅色專家。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部与学校的領導都心中無數。学校中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教学改革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应当起什么作用？这样重要的問題，在我和高等教育部的接触中，从来沒有听说他們

研究过或討論过。

几年来教学改革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認為是执行教学改革过程的盲目性。我們要學習苏联，这一点是肯定的，大家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要从學習苏联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入手，而逐步提高到學習教学內容这样的路綫，不論在高等教育部或在北京大学，我从来沒有參加过討論，而事实上或者也沒有討論过。自从1952年新的北京大学一成立，我們教务处就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自己一直到1954年的寒假进行教学經驗交流会时，才認清楚有这样一条教学改革的路綫。我相信在学校里的教师中，到今天一定还有很多人对这条路綫不够明确。由于党的威望高，任何工作領導上一号召，青年們就热烈地响应并積極地行动起来，但是許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就得要問，为什么我們要这样做呢？無怪乎有的北京大学校務委員說，北大校務委員會只討論如何做而不討論應該不應該做的問題。这就好像一个队伍的进军目标是清楚的，进军的道路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队伍的司令員沒有說明为什么要沿着这条路綫进军，而队伍的各級指揮員也沒有討論过必須采取这条路綫进军的道理。这样就不能不降低我們的工作效率，給工作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党必須領導高等学校

第二，党领导高等学校的問題。院系調整是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三反运动在旧高等学校中树起了無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旗帜。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能很快有收获，是和三反运动分不开的；这也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当然三反和思想改造过程中，在有些具体問題上，